

第二届中国经济史青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王姣娜

近年来,中国经济史研究在研究主题、史料发掘、研究方法等方面都呈现出一些新特点,为了能够及时地反映这些研究进展,鼓励青年学者关注经济史研究的基础问题和前沿领域,加强中国经济史学界青年学者的交流,《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于2018年发起了“中国经济史青年学术研讨会”。继去年成功举办了首届会议后,2019年4月20—21日,《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共同举办了“第二届中国经济史青年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共收到投稿论文162篇,入选参会稿件39篇,来自国内数十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的青年学者和知名经济史专家参加了会议。

本届研讨会的论文总体上呈现出以下特点:重视民间资料等新史料的挖掘,对鱼鳞图册、民间契约文书、商会档案等资料的不断发掘和利用,使得在地权、赋税、市场交易等领域的研究出现了一些创新性解读;基于GIS的地理空间分析与经济史的结合带来了新的资料处理手段与分析框架,计量方法的应用也推动了对历史数据的进一步挖掘与重新解读;问题意识较强、视角新颖,拓展了既有领域的研究范畴,丰富了对研究主题的理解;研究中不乏突破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多学科融合,关注经济变迁中的环境、制度、政治等因素。

一、明清赋役与社会经济转型

国家财政与近代化转型是近年来经济史研究关注的热点问题,会议中有多篇论文利用族谱、契约、账簿、碑刻、档案等民间资料,从微观视角对明清时期财政转型与经济社会变迁进行了考察。

赵思渊(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针对清代多种土地字号系统共存使用的问题,重新审视了清代前期乡村社会中土地权利与官方土地登记之间的关系。文章使用徽州歙县的鱼鳞图册,匹配当地的家谱、契约,发现鱼鳞图册只是保障土地信息、土地权利的证据链之一环,任何一种鱼鳞图册及其背后的土地清丈、土地登记,如欲发挥征收赋税的效用,以及对土地权利予以法律裁判的效用,都必须同其他的民间文献共同构成一个相互匹配的证据链才有可能。黄忠鑫(暨南大学历史学系)关注到不同时期土地字号使用存在差异的现象,从个案和民间文书入手,考察了明清徽州土地字号分配单元的长期演变趋势、民间使用习惯,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图甲组织与土地字号结合后的运作情况,认为本为户籍赋役组织的图甲组织已有相当一部分具有了明显的地理因素,在执行土地清丈、保持鱼鳞册传统的地区,图甲组织的地缘特征可能更为显著,基层行政管理的功能也不会单一。王一帆(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选取了同治年间江苏减赋改革中的重要实施环节之土地清丈,考察了太平天国战后江苏土地清丈推行的起因、与减赋改革的关系、清丈的推行过程与多重阻力,指出由于当时地图测量技术的发展所产生的土地清丈新方法,使各地赋税册籍开始逐步由传统的鱼鳞图册向近代都图地籍图系统转变,澄清了关于民国地籍测量主要受日本影响的观点。

申斌(北京大学历史系)关注的是明代财政体制转型的起始阶段,在课征对象转变与定额化逻辑基础上,围绕“从不需要核算到需要且可以核算”这条官厅会计演变主线,探讨了明代地方官府赋役核算体系的早期发展。文章认为明洪武到弘治间,州县赋役征发管理从整体上既不需要也没可能计算和计划的状态,向需要且可以计算和计划的状态转变,是地方官府可核算财政体制形成的起点;为

[作者简介] 王姣娜,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编审,北京,100836。

了通过使赋役“均平”而确保可持续征发,各级官府围绕征收定额化、派征对象标准化以及派征规则进行了探索。丁修真(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从明代科举经费入手,通过对现存赋役志书及相关文献的梳理,考察了科举经费的规制与内容、编征与变化、作用与影响,发现随着明代国家财政转型与赋役改革的推进,与之相关的科举运作逐渐由役转费,地方宾兴在有意控制地方科举生员经费的同时,于乡、会试层面设计了相当比例的浮额,而科场供应因其本身对物与人的要求,在经费化的同时仍摆脱不了对“役”的依赖;科举制在实现阶层流动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不菲的经济成本。

蒋宏达(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以特定人群的现实遭遇和基层社会如何适应历史变迁为视角,择取了明代杭州湾南岸盐场地区一个具有灶户和军户双重户籍身份的特殊人群——军灶户,通过追溯元末至明中期这一人群从滨海豪民之家到军灶人群,再到科第望族的嬗变历程,探讨了明初禁抑豪民政策对地方权力结构造成的影响以及基层权势演变的内在社会动力。蒋勤(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和王泽堃(上海交通大学材料学院)以清代一个地主家庭 35 年的雇工完整记录为个案,考察了清代乡村的地方性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和特点。文章使用石仓文书中阙翰鹤的家计账簿、契约与票据,从雇主经营农业和日常生活角度,分析了乡村的雇工结构、工资真实水平、支付方式,以及乡村社会信用交易的基础,认为基于“道义经济”生存伦理的地主以生产性雇工为主、雇工依赖地主供给实物工资的现象,与基于“理性小农”市场交换所必须的记账核算能力,可以并行不悖。

二、地理空间分析与量化方法应用

作为一个大国经济体,经济的空间属性是中国经济史研究持续关注的话题,历史上的经济地理研究因而也成为近来备受重视的研究领域之一。基于 GIS 方法的地理空间分析等方法,给经济史研究带来了新的资料处理手段、分析方法和成果展示方式。此外,量化方法也进一步促进了对历史数据的挖掘和创新性解读。

方书生(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关注的是 19 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众多口岸开放、近代工商业发展以及社会生产方式与组织方式的变化,而开始的中国经济地理大变局。文章以华南地区为例,通过解析该空间价值循环的微观基础、路径与模式,形成一个解释近代中国经济空间属性及其变化的动态框架。研究认为近代中国经济空间秩序的形式可描述为发端于“口岸—腹地”格局上的地域化经济体及其全国性组合,表现为以“地域化经济体”为载体的区位价值发现与空间资源配置优化的演化进程。刘雅媛(上海财经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通过对近代交通网的复原来探索基层市场流通实态。文章利用近代邮政事务年报、邮政局所汇编、邮政舆图三类史料,梳理了近代长江三角洲邮政行业的发展脉络,从邮区划分、邮政点等级、邮路类型及邮路里程几个方面复原了近代长三角邮政空间的形成与演化,认为邮政网络与市场网络存在密切关系,近代江南地区邮政网络与基层市场网络重合度较高,体现出极强的地域特征。牟振宇(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以民国时期的法租界为个案,对上海地价进行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的分析。文章以法租界公董局编制的地籍图册为基础,运用 GIS 方法,复原了法租界 1924、1928、1932、1934 和 1941 年每个宗地的地价分布,剖析了法租界地价的时空演变,并结合其他文献,从房地产开发、人口增长和交通条件三个方面,分析地价上涨的驱动机制。

王哲(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关注的是对历史上中国城市体系的整体性研究,文章选取了近代中国若干较为可信的城市人口数据,同时以施坚雅城市数据和旧海关贸易数据作为验证,对近代中国的城市体系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近代中国城市体系的分布模式,整体上符合位序—规模标准曲线,在“近代化早期”的历史阶段里,已经发展到了其所能达到的“成熟”而稳定的阶段;而且与欧洲近代化前期城市体系对比来看,近代中国城市体系进入了农业社会末期的状态,保持了极大的历史稳定性和惰性。高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和袁为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

所)从经济地理学的视角考察了晚清民国时期近代邮政分布的经济特征。文章利用晚清府级年度数据考察了邮政机构的宏观分布,发现各府邮政机构数量与到最近通商口岸距离显著负相关,拥有较大通商口岸的省,受工商业发展与贸易水平等现代经济因素影响更多,其他省份则更多受人口、交通等传统经济因素的影响;同时文章利用1932年“县以下镇市村落调查”截面数据,考察了邮政微观分布,发现县城、市镇等集镇凭借传统基层市场体系的“中心地”的经济地位,能够显著提升邮政设施的概率与邮政机构等级。

余开亮(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回应的是“大分流”前夕的清代中期是否形成了统一的、整合的国内市场问题。文章利用清代粮价数据构建了一套对区域市场整合程度进行度量的评价指标,采用相对价格法对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中多种时空尺度的市场整合程度进行比较,结果显示市场整合的程度是随时间和空间变化而发生变化的,整体上中国的市场整合程度在18世纪中期和后期要高于19世纪前期,南方和北方的市场整合程度变化趋势基本一致,而各个区域市场之间的整合程度差异性较大。因此文章认为,问题的答案不应该是二元的,而是回答在多大程度上市场是整合的。林友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对明代科举贤能制度中的偏袒主义进行了量化研究,认为顶层权力的影响导致了地域偏袒主义的存在,也从一个侧面讨论了科举制度对社会流动和政治稳定的影响。文章构建了明代科举数据库,使用双重差分模型,估计了明代权力中枢(内阁)对科举取士的影响,结果表明:内阁对科举会试阶段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在殿试阶段,与阁臣拥有相同籍贯的考生将获得更高的甲第,并且更有可能在馆选中被选为庶吉士;阁臣中,首辅对殿试和庶吉士选拔的影响较次辅更大;阁臣卸任后对科举的影响即不复存在,而次辅对科举殿试的影响则随着任职时间的延长而加强。

三、货币金融在经济中的作用

近年来,经济史和经济学研究都越来越关注金融在经济增长与转型发展中的作用,此次会议中的几篇货币金融史领域的文章,亦多从研究对象与区域经济、工商业发展、经济危机、社会流动与变迁的关系等角度展开研究。

赵士第(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和邱永志(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对清代“东钱”进行了考证,文章结合地方志、官方政书、上谕档、奏折等史料,以及民间交易契约文书、碑刻资料等,重新审视了清代东钱的流通区域、性质及来源问题。研究认为东钱的来源可追溯至原明代“行钱之地”使用小旧实钱,由于商业往来,行用范围从最初的直隶扩大到包含直隶东部26县、奉天全境、吉林大部分地区,及黑龙江、蒙古、山西部分地区,最终确立了制钱160—165文兑换小数钱1000文的比价定制或惯例;东钱的表现形式呈现多样性,短陌形式的虚拟钱法、纸币形式的官私钱票等不仅并存行用,且还存在所谓制钱形式的“东钱”。韩祥(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以小额通货为中心,考察近代山西货币体系更替与乡村生活变迁。文章搜集未刊官方档案、民间报刊与社会调查等文献,以小额通货的快速更替为主线,探讨了1894—1927年间山西省货币体系的运行、更替及其对乡村生活的影响。研究表明,山西货币体系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演化周期,其间随着城乡主体小额通货出现制钱、私钱、铜元、铜元券的快速更替与加速贬值,广大乡村地区频繁发生钱荒危机与通货膨胀,农村原有的小额硬通货大量流入城市金融部门,同时城乡市场的日常物价、工资水平、银铜比价也受到货币更替的巨大冲击。荣晓峰(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以天津为中心,考察了近代中国区域银两制度的变迁。文章利用民国时期的报刊史料以及日本在天津的调查资料,回顾了近代天津银两制度经历的发展与兴盛、动荡与变革、衰退并最终被强力废止的三个阶段,认为天津作为近代华北地区贸易和金融中心,其银两制度的变迁在内部演进和外部冲击的影响下,总体上呈现由实银两向虚银两转变的特点,以行化银为主的天津虚银两制度发挥了转账结算、支付借贷、债务冲销、货币汇兑等重要的货

币职能。

李婧(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周建波(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讨论的是清代借贷市场的发展与江南社会流动的关系。文章以借贷市场较为发达的江南地区为例,使用地方志、碑刻资料、清代信件等史料以及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发现灵活而广泛的借贷活动能够通过影响经济主体的效用来影响社会流动,同时社会流动也会为借贷活动提供更多的交易机会和更大的金融风险,进而对借贷活动产生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娄敏(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关注的是民国时期商业信用票据市场,文章利用民国江津商会档案与江津司法诉讼档案,分析了商业信用票据的分类及特征、产生与运转、功能与风险。文章通过对债务纠纷案件的梳理与解读,发现“商业信用票据”在县域与跨县贸易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媒介作用,促进了票据市场的制度化与长江上游商品市场的繁荣发展,但也导致了“三角债”矛盾的不断激化。

徐锋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从信用扩张与资金融通视角,考察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金融业发行银行承兑汇票的情况。文章依据原始档案和相关报刊资料,探究了银行承兑汇票的倡导发行经过及其对社会经济的作用,指出承兑汇票业务推动了上海市面逐步形成票据交换制度,最终取代了传统钱庄的汇划制度,促进了上海票据贴现市场逐步走向成熟,有利于市面的资金融通,也巩固了日常经济生活中的社会信用。张秀莉(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从风险防控与业务拓展角度,研究了中国近代银行仓库。文章分析了银行仓库的由来及沿革,银行仓库经营管理中的法规条例、组织管理、业务流程,并重点考察了银行仓库与抵押贷款的关系、银行仓库的经营收益及银行仓库的衍生业务。赵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考察的是1863—1927年上海押店业的变迁。文章依据《申报》《时报》等报刊资料以及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阐述了近代上海押店业的种类异同、起源发展以及政府对押当业的态度与管制,回顾了近代押店业从非法到合法、从边缘到主流的演变过程,认为虽然近代押店业因其高利盘剥的负面形象而备受各界指责,但其存在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

刘诗古(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利用各类公开或内部出版的财经文献以及地方未刊档案,考察了新中国建立初期财政经济的危机与重建,指出在加强对农业税、工商业税的征收和管理的同时,新中国政权积极利用货币发行和公债推销等金融手段增加了收入和回笼货币,因而在短时间内结束了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实现了收支平衡。

四、历史变迁中的行业与企业研究

会议中关于行业史和企业史的研究,分别选取了明清变革、近代化转型与新中国建立等历史阶段,将研究对象纳入历史变迁之中加以考察,注重基于比较视角的长时段宏观分析,以及将个案研究与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相结合。

赵国壮(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关注的是中国糖业经济发展的“明清变革”,认为其上承宋元时期中国制糖业的革新成果,下启近代以来中国糖品的大规模生产,可以为理解“大分流”论争提供一种思路。文章以明清时期中国糖业经济变革为问题导向,梳理明清时期中国糖业经济的发展及转型,指出甘蔗种植从名贵植物发展到普通经济作物,手工制糖技术发展达到峰值,糖品消费呈现了大扩张趋势,并分析了糖品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同时,通过与18—19世纪西方甘蔗种植园经济相比,指出中国糖业经济的这些变革是内生性的,是中国糖业经济自唐宋以来长期发展而积累起来的比较优势。

赵伟(苏州科技大学历史系)关注的是近代化进程中民族棉纺织企业的扩张行为。文章从“事业集合”维度回顾了1895—1937年约41家中国民族棉纺织企业经历的“横连”“纵合”“多角”等扩张经营过程,认为民族企业的“集合”行为增加了民族工业中先进部分的分量,推动了中国工业化进程,

并促进了传统与现代生产部门的糅合与嬗进。郭岩伟(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考察了近代中国外商企业债券的基本特征。文章在解读《北华捷报》和《字林西报》刊载的近代中国外商债券市场收盘行情表的基础上,运用近代英文报刊刊载的相关外商企业股东会记录、董事会记录和企业年报,以及相关企业的英文原始档案和工部局档案等资料,在初步梳理近代中国外商企业债券发展概况之后,对其基本特征进行了归纳,认为近代外商企业债券基本承袭了西方企业债券制度,与华商企业债券差异明显。

陈碧舟(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龙登高(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以公茂机器造船厂为例,考察了新中国建立初期对“隐匿敌产”企业的改造。文章依据当时被定性为“完全违法户”的公茂船厂档案,考证了“五反”运动中被定性为“隐匿敌产”的私营企业的民主改造和产权变化,研究表明“隐匿敌产”企业改造的一般路径为定性、没收、接管、转为国家投资、社会主义改造。宋睿奇(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慈鸿飞(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以永利铔厂劳资协商会议为例,考察了新中国初期私营企业视域下的劳资协商制度。文章使用南化公司档案馆所保存的永利铔厂档案资料,参考当时政府对于永利铔厂的调查研究,剖析了私营企业接受劳资协商会议制度的真实心态,以及劳资协商会议对企业的影响,认为劳资协商会议对于私营企业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但在推动的过程中,劳资协商会议也逐步在将私营企业纳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中来。

五、新视角与跨学科融合

作为交叉学科的经济史学,近年来出现了突破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多学科融合趋势,学科交叉日益多元化,经济变迁中的环境因素、制度因素、政治因素等受到关注,一些研究突破了传统经济史研究的固有框架,综合了多学科的方法。此外,在研究热点领域,一些文章选取新视角、提出新问题,如从制度与思想等较为宏大的视角研究历史进程,或是从微观的民生角度来研究经济社会的运行与变迁等,拓展了经济史研究的范畴,也加深了对研究主题的理解。

熊金武(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着眼于对经济思想史中欧洲中心论的反思,选择土地财税变革的核心命题——土地单一税作为研究对象,从微观角度考察了全球范围内土地单一税思想的演化、传播及本土化,并分析了中国与世界在全球经济思想变迁中的关联与影响。文章指出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变迁是一个复杂的全球范围内的动态变迁过程,中外经济思想交流构成了不同思想范式竞争的思想市场。缪德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挖掘中外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比较研究方法,考察了国民经济核算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对国民经济核算思想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指标——“国富”学说的演进、“国富”学说的内涵及其价值、估算“国富”的热点问题及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和影响予以爬梳。

刘婷玉(厦门大学历史系)引入环境史研究的视角,结合方志和新出的畚族族谱资料,对畚族早期经济生活进行探索。文章通过梳理宋代以来福建地区山区森林的生态变迁过程,发现伴随着虎、象的消失和山区水利工程的兴废,畚族的生计方式也随之而变迁。畚族先民逐步放弃了原有的高山旱作和游耕的生计方式,适应了定居山区、开垦高山畚田和种植水稻的经济生活,但狩猎依然是其重要的经济生活补充。邓广(聊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考察了1912—1936年近代山东农村的赋税、负担与农民生活境况,研究显示近代山东田赋征收量的高峰发生在1925—1928年张宗昌督鲁时期,1929—1936年间田赋征收量下降且趋于稳定;考虑到物价变动,田赋征收量在张宗昌时期为民国初期的2.5倍左右,国民政府时期则与民初的征收量大体相当;从农民角度观之,赋税的实际征收量最高为农民收入的27%,一般年景在12%左右。文章认为20世纪30年代山东农民生活水平趋于恶化的根源主要是受世界经济危机和东北经济接济断绝的影响,赋税征收并非主要因素。林超超(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综合考虑货币工资收入及购买力、非工资性收入、供养人口等因素,对20世

纪 50 年代上海地区工人家庭生活水平进行了分析,并重点比较了 1956 年全国工资改革前后的工人家庭生活水平变化。文章指出上海工人家庭的生活水平在 20 世纪 50 年代并没有实现与工业生产的同步发展,国家各项福利保障体系的建立对于提高工人家庭生活水平的作用有限;不论是工资标准的制定还是福利保障的供给,国家都更趋向于采取低标准和平均化。

李昕升(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基于农史和人口史等理论与相关研究,对“美洲作物决定论”(即美洲作物之于人口增长有巨大作用)提出质疑。文章认为清代最重要的技术革新是一岁数收和土地改造,美洲作物推广作为技术革新之一,是由人口增长决定的,而不能倒因为果。美洲作物价值凸显的时间在 19 世纪中期之后,且主要在山区缓解人口压力,在传统社会美洲作物难以打破原有的种植制度,在“钱粮二色”的赋税体系下只能是糊口作物,是农业商品化粮食不足的补充。王庆明(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张甜甜(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关注清代禁留地私垦私放屡禁不止的问题,通过对《准格尔旗札萨克衙门档案译编》《清代至民国时期归化城土默特土地契约》等资料的梳理,将清廷“禁留地”垦殖政策划分为禁垦、限垦和放垦三阶段,并从产权的社会视角对禁留地制度演变过程给出一种理论解释。张世慧(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以 19 世纪中后期长江及沿海主要商贸口岸的倒账案为对象,考察清代基层政权对于维持商业秩序进行的社会治理及司法审判。文章通过梳理地方官府的介入、审理状况,发现地方官府对钱债案审断并非一概而论,而是根据该案对自身利益的影响程度,采取不同的审断标准,反映出地方官府介入商业活动的复杂性。

杨豪(河北大学历史学院)从革命史视角解读华北解放区土改运动中果实分配的公平性问题,利用档案、汇编和报刊等资料,将乡村社会与革命实践相联系,从逻辑和机制层面进行考察。文章认为华北解放区的果实分配模式是一种结果平均,实践中却存在着分配不均的现象,这跟果实分配政策、干部薪酬机制以及农村财政制度均有较强的关联。齐秀琳(郑州大学商学院)利用博弈论模型,讨论集体化时期农民的劳动积极性问题。文章对以往学界以“退社权”假说为代表的解释提出质疑,指出过去的讨论皆建立在报复策略为“冷酷”策略,且该策略在他人不合作时一定会被触发这一过强的假设上;若放弃该假设,则农民选择积极劳作或偷懒的博弈均衡在理论上都能实现,进而认为当时农民与“单干”时相较劳动积极性固有不足,但在诸多条件约束下也决不会以“磨洋工”度日。郦菁(浙江大学社会学系)运用社会学“政策范式”转换的传统文献和最新发展,重新审视包产到户的政策制定过程,重点关注政策制定、理念与利益的交锋等面向,力图在历史情境中重新发现改革的政治学,更好地理解 20 世纪 80 年代农业政策与此后农业发展的关系。

本届研讨会以分组讨论的形式进行,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高超群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贺水金研究员、中山大学历史系黄国信教授、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李玉教授、河南大学经济学院彭凯翔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魏众研究员、复旦大学历史地理所吴松弟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燕红忠教授等知名学者(以姓名拼音为序)担任点评专家,分别主持八个分组讨论,对小组论文进行评议,并对青年学者的研究提出建议。会议气氛热烈,讨论充分,不乏犀利交锋和思想碰撞。

此外,研讨会设立了“期刊与学术研究”专题讨论环节,与会期刊代表介绍了刊物的基本情况,并与青年学者就期刊建设如何与学术研究推进互相促进、如何开展跨学科研究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闭幕式上,青年学者刘雅媛、张秀莉、蒋勤、赵思渊、赵国壮、申斌、缪德刚、韩祥分别代表所在小组对分组讨论情况作了总结报告。会议宣布第三届中国经济史青年学术研讨会将由《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与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共同主办,计划于 2020 年上半年在重庆召开。